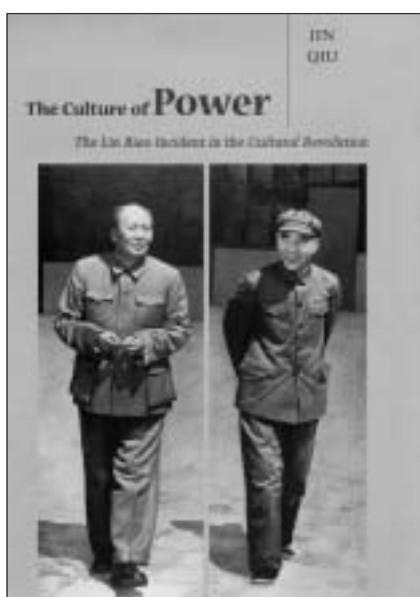


## 一代革命者的心理肖像

● 董國強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權力的文化》(*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下引只註頁碼)是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於1999年推出的一部學術論著，作者是受到「林彪事件」牽連的吳法憲將軍的女兒金秋。由於該書的敏感題材、作者的特殊身份以及哈佛大學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的大力推介，該書出版以後立即受到學界的

普遍關注。八年多過去了，期間有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金秋編輯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和舒雲撰寫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等大部頭著述相繼問世，該書早先獨特的史料價值已經變得不甚重要，但是作者的學術貢獻依然不容抹殺。

就筆者有限的閱讀視野而言，在論述文革問題時，中外學者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國外學者往往從理論框架的構建出發，比較注重研究視角的創新；國內學者往往從直接經驗出發，比較注重歷史事實的鋪陳。金秋作為一位中國學者，尤其作為一個前中共高幹的家庭成員，在相關史料的採集和解讀方面是眾多國外學者難以匹敵的；另一方面，她先後在美國夏威夷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等著名中國研究學術重鎮接受教育和從事研究工作，得到過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李鴻永、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裴宜理等多位知名學者的悉心指導，其社會科學的綜合理論素養又大大高於許多國內學者。這兩大優勢的結合，

金秋作為一個前中共高幹的家庭成員，在相關史料的採集和解讀方面是眾多國外學者難以匹敵的；其社會科學的綜合理論素養又大大高於許多國內學者。這使得《權力的文化》在眾多同類作品中脫穎而出，獨樹一幟。

使得《權力的文化》在眾多同類作品中脫穎而出，獨樹一幟。

金秋在闡釋自己的研究路徑時強調，該書側重考察的是一些「體制外因素」——主要包括歷史人物的性格品行、個人經歷、社會關係等——在政治領域的作用和影響。原因是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的「人治」特性，使得一些西方通行的政治學分析框架和概念範疇——例如政治組織、意識形態、正規化的決策機構等——往往不能夠很好地解釋相關問題（頁3）。作者的這種研究取向得到裴宜理教授的認同。她在為該書撰寫的〈序言〉中指出：

對於那些習慣地認為精英決策是高度理性產物的人而言，金秋博士的敘述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震撼。這裏我們很少發現「手段」與「目的」之間的清晰關聯。作為替代，我們看到的是生理和心理的病變、無來由的恐懼和嫉妒、家庭不和、瞬間爆發的人際衝突和藥物反應所導致的神志迷茫在「文革」期間如何左右着精英們的行為。（頁ix-x）

為了探究「林彪事件」的真相，金秋在書中系統回顧了革命時期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及其在文革期間的發展。她用大量的旁證材料說明：第一，作為毛澤東的長期追隨者，林彪對毛澤東的政治忠誠是毋庸置疑的，這種政治忠誠和傑出的軍事政治才幹是林彪在黨內軍內得到迅速升遷的前提條件（頁63-72）。第二，林彪對個人權力似乎並沒有特別強烈的欲望。這部分源於淡泊的天性，部分源於健康的原因，部分源於對中國宮廷政治的透徹了解。

對於被毛澤東選定為「接班人」，林彪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恐懼。「伴君如伴虎」的古訓，使得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始終恪守「被動、被動、再被動」的信條（頁78-80）。他雖然貴為「副統帥」，卻很少過問政府和軍隊的工作。這無論與異常活躍、到處插手的中央文革成員，抑或是忍辱負重、苦撐危局的周恩來均形成鮮明的對照。文革期間發生的一些表面看來造成林彪個人權力擴張的事件，如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高層人事變動、1967年初的「三支兩軍」和反擊「二月逆流」、1967年夏的「武漢事件」和1968年春的「楊余傅事件」等，其實都出於毛澤東的乾綱獨斷。林彪在這些事件中的表現與其說是「趁火打劫」，毋寧說是「明哲保身」。

第三，林彪對毛澤東的政治忠誠，並不意味着他對一些具體問題沒有個人判斷。正是基於社會穩定大局的考量，林彪積極支持「軍委八條」的出台（頁97）；正是出於對中央文革支持軍內造反派挑起派性武鬥的不滿，林彪曾經與江青發生過正面衝突（頁95）；正是出於對周恩來艱難處境的同情，林彪曾告誡其部下支持周的工作，而不要聽信江青、康生等人的挑唆（頁119）。

第四，「九一三事件」發生以後，中國官方公布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二、三）〉，曾經對1970年夏天廬山會議上的「天才論」和「國家主席」之爭大加渲染，以此作為指控林彪「陰謀篡黨奪權」的論據。而金秋則含蓄地指出，毛澤東與林彪的政見分歧早在1969年春中共「九

金秋用大量的旁證材料，說明林彪對毛澤東的政治忠誠是毋庸置疑的，林彪對個人權力似乎並沒有特別強烈的欲望。對於被毛澤東選定為「接班人」，林彪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恐懼。

大」前夕已經初現端倪。如果說當時確實存在着一條所謂「林彪路線」的話，那麼陳伯達根據林彪意見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應該是這條「路線」的具體表現。這個政治報告之所以遭到毛澤東否決，是因為它批判了伯恩斯坦主義傾向，主張盡快結束文革動亂，把主要精力轉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頁117-18）。

第五，以所謂「國家主席」之爭來指控林彪，不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政治伎倆。首先，設立國家主席與否的爭議是由修憲討論引發的，就這個問題發表各種不同意見，原本是任何一個公民的合法權利。其次，毛澤東幾次通過汪東興傳達指示，並沒有將自己的真實想法和盤托出，而是在關鍵問題上含糊其辭，前後矛盾，箇中玄機實在讓人難以捉摸。第三，從廬山會議的討論紀錄看，設立國家主席並由毛澤東擔任，是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共同呼聲。所以試圖以此指控林彪「陰謀篡黨奪權」，顯然是無法令人信服的（頁120-25）。毛澤東後來老羞成怒，不但斷然否決了這個提案，而且責令一大批支持這個提案的高級幹部作「檢查」，這除了充分表現出毛澤東的專橫跋扈之外，不能說明其他任何問題。（至於毛澤東究竟出於何種考慮堅持不設立國家主席，目前學界存在幾種不同的解釋。究竟哪一種解釋更加符合歷史真實，還有待相關史料的進一步公開，但無論如何同林彪「陰謀篡黨奪權」無關。）

第六，儘管否認「天才論」之爭折射出當時黨內高層內部的利益衝突和權力鬥爭，但這場衝突和鬥爭的雙方是以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和

以江青、張春橋為首的激進文人集團。這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的明爭暗鬥，並不必然地影響到他們對毛澤東的政治忠誠。毛澤東出於意識形態和個人情感偏好，坐到激進文人集團一邊，為這場爭論賦予了特殊的政治含義，使得林彪等人的言行帶有「犯上作亂」的意味。

由此可見，廬山會議上的衝突是「九大」前夕毛、林政治分歧的一個意外結果。導致雙方矛盾升級的關鍵原因不是林彪等人的政治野心，而是毛澤東對林彪等人的個人成見。正是出於對毛澤東無限上綱做法的嚴重不滿，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不但拒絕自我檢討，而且指示其部下不要輕易做檢討（頁126-30）。這進一步加深了毛、林之間的裂痕。此後，毛一方面向全黨發出「三要三不要」的號召，另一方面則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倒林」三步曲——「甩石頭，搵沙子，挖牆角」，最終導致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的發生。

金秋的上述幾點看法都得到國內知名文革研究專家的認同。王年一、何蜀和舒雲等人近年來發表的不少論著，都是圍繞上述幾個主題展開的。特別值得讚賞的是，金秋在書中精闢地概括了毛澤東開展黨內鬥爭的四步曲模式：第一，每次鬥爭總是始於毛對某人的不喜歡、不信任；第二，初步的齟齬發生之後，毛便開始利用各種場合向各級幹部游說，努力營造一種反對某人的「共同意見」；第三，當毛感到勝券在握之後，便召集會議開展所謂「批評與自我批評」，質言之就是調動各種黨內力量對某人展開批判圍攻，迫使某人承認錯誤；第四，一

書中指出，從廬山會議的討論紀錄看，設立國家主席並由毛澤東擔任，是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共同呼聲。所以試圖以此指控林彪「陰謀篡黨奪權」，顯然無法令人信服。

金秋指出毛澤東的悲劇在於，他沒有自覺地完成由一個「超凡魅力型領袖」向「法理型領袖」的轉變，也沒有領導全黨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換。

旦某人承認錯誤，毛就會以全黨的名義對他做出有罪判決，並以「組織反黨小集團」的罪名將其清除出黨（頁5）。如果我們不糾纏於細節，便不難發現「林彪事件」與反對彭德懷和劉少奇的鬥爭具有結構上的相似性。而「林彪事件」的獨特之處在於，儘管毛軟硬兼施，林彪至死都沒有作出像樣的「自我批評」。這未免使得毛清洗林彪的四步曲不是那麼「完美」。

金秋不但在書中運用大量旁證材料為我們描述了一個與官方說法截然不同的「林彪事件」，而且還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歷程。她並沒有出於受害者的偏見而對毛澤東加以妖魔化，而是通過對中國革命歷史的回溯，解釋了毛澤東何以成為一個超凡魅力型領袖（頁19-22）。她客觀地指出，這種個人超凡魅力的表象不僅誤導了全黨和全國人民，也誤導了毛澤東自己。毛澤東的悲劇在於，他沒有自覺地完成由一個「超凡魅力型領袖」向「法理型領袖」的轉變；與此相關，他也沒有領導全黨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換（頁22-23）。他的思想狀態依然停留在革命時期，以往的成就使他堅信自己無所不能。結果，由他親自發動和指揮的大躍進成為他個人政治生涯中的滑鐵盧（頁28-30）。此後，毛澤東一方面為了維護自己的烏托邦信仰，另一方面為了維護自己的超凡魅力神話，不知疲倦地展開了一輪又一輪黨內鬥爭，直到他1976年逝世為止。

除了依據史實作出以上經驗層面的敘述之外，金秋的獨特貢獻在於綜合運用政治學和心理學的視角

和方法，對毛澤東時代的「老人政治」現象進行了分析和論述。她首先援引著名心理學家麥金太爾 (Angus McIntyre) 和弗茲伯加 (Yaacov Vertzberger) 等人的研究成果，指出一般人在由青壯年期步入老年期後可能遭遇到的生理和心理病變，以及這些病變對人們判斷能力和行為方式的影響，並將這種觀點用於解釋大躍進以後毛澤東的乖僻思想和行為（頁42-60）。筆者以為金秋的這種解釋方法並非無稽之談——既然我們承認毛澤東是一個凡人而不是一個「超人」，那麼他就無法逃脫客觀規律的制約。毛澤東晚年表現出的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猜忌多疑、自我中心、喜怒無常，的確是老年偏執狂的典型症候。如果說「體制外因素」是通過體制性因素而發生影響的話，那麼當時中國政治的體制性問題便在於無法擺脫這種病態的「老人政治」。愈來愈多的黨內精英相繼淪為「老人政治」的犧牲品。

在該書的結尾部分，金秋還依據間接證據和心理分析，很好地回答了一個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即為甚麼黨內高層中許多人（包括劉少奇、林彪和周恩來等）早已意識到毛澤東的錯誤，卻沒有勇氣公開地對他的錯誤加以抵制（更不要說試圖取而代之了）？她認為這種現象根源於第一代革命者對毛澤東的個人忠誠，並進而指出這是由以下五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一是對毛的尊重；二是對毛的畏懼；三是自我認同的需要；四是對共同事業的信仰；五是既得利益的考量（頁203）。如果我們對中國革命的歷史比較熟悉的話，就不得不服膺作者的洞見。

綜上所述，《權力的文化》一書以「林彪事件」為中心，但是其涵蓋內容遠遠超出具體事件本身。金秋寫作的重點與其說是為林彪鳴冤叫屈，不如說是探究「林彪事件」為甚麼會發生。該書對「林彪事件」具體

過程的細緻再現，客觀上有助於我們了解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的本質和肌理。儘管作者一再強調，該書着重探討的是一些「體制外因素」，但是在筆者看來，遭到扭曲的體制性因素的影響作用依然清晰可見。

## 「曲折」的文革故事

### ● 劉捷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關於文化大革命中以單位（如學校、部門等）為對象的研究，在學術界基本還處於起步階段。馬繼森女士的《外交部文革紀實》（以下簡稱《紀實》，引用只註頁碼）一書就是近年來有關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馬女士文革期間在外交

部工作，參與了文革，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成員，「在1967年犯了錯誤，對那以前和以後發生的錯誤也有深切的體會」（頁365）；除了《紀實》，她還曾經和冉隆勃合著《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香港：明窗出版社，2001）。

在撰寫《紀實》的過程中，作者搜集了大量文革時期外交部的檔案文獻材料，包括領導人的講話記錄、大字報、紅衛兵小報等，並採訪了許多歷史當事人。作者利用這些文獻和口述材料，為我們揭示了大量鮮為人知的事實。另外，因為作者的特殊身份，使得《紀實》一書還帶有半回憶錄性質。像郭贊之死、外交部內部對王海容與唐聞生二小姐的看法、喬冠華的性格等，在檔案文獻中都是很難找到的素材，但在作者筆下卻信手拈來。此外，此書文筆也相當生動流暢，頗有些行雲流水的感覺。

作者對以往有關文革時期外交部的研究是不滿意的。她認為：「三十多年來，外交部文革真相被演繹出的一幅幅漫畫遮蓋了。從這幅漫畫中看不出文革有甚麼不對，

「幾個反革命野心家要奪權」的所謂「故事」，是現在中國大陸官方文革敘事的範本，文革進程的複雜性因此被抹去，所以馬繼森說，外交部的文革是「曲折」的，而「外交部的曲折是全中國文革曲折的一個縮影」。